

潘醒农把 Geylang 依闽南话译为“牙笼”，不知当时不懂新加坡地名的人，看了这专名，是否以为它是装蛀牙或猪、牛牙的笼子。李健才把 Geylang 音译为“牙兰”，稍微文雅些，但就不如闽南话“笼”那样贴切地接近“lang”的原音。“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又把 Geylang 翻译为“芽笼”，但这不是豆芽或幼苗的笼子！

第七节 结语

纵观1819年至今所出现的约6500条的地名，它们的历史发展沿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地名数量由少而多

地名的数量，自1950年的近1600条增加至2019年的4660条。从下表可以看出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正处在突飞猛进的时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新地名激增了将近2000条，超越了前130年间所累积的地名。大量新地名的出现，表示经过巨大的建设。随着1979年的金融危机，紧接着的经济萧条，新地名的增加量也因此放缓。因此，从1981至2005年间，新地名只增加了760条左右。从1819年到现在，前后共产生了约6500条地名，而现存只有4600条。因此，许多有纪念性的地名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年份	1936	1950	1970	1981	2000	2019
地名总数目（约）	920	1580	2900	3490	4050	4660

（二）通名类别越来越多

1950年，通名与单词地名（包括 Piccadilly、Causeway 与 The Oval 之类）共有73项，根据出现率多寡来排列，首14项所涵盖的地名高达90%。到了1981年，通名增加至95项而首24项所涵盖的地名总和方达90%。

年份	1950	1970	1981	2000	2016
通名/单词（项）	73	81	95	99	87
涵盖90%须要的通名种类（项）	14	15	24	29	18

(三) 地名中的生造成分越来越多

前文提到通名大量的增加，专名的增加更是日新月异。从主要以人名与移用地名（以外国地名为新加坡地名）为主，转换为各式各样。不过，可以肯定地说，除非是总统、总理、部长或非常杰出的人物外，以后能增加的人名地名肯定很少。因为新加坡未被利用的土地不多，不如从前那样可以自由购买大片土地，由地主在自己的土地范围内造路，还以他的姓名为路名。前文还提及SBNB自2003年开始，全权负责新地名的命名。此外，政府一直强调民众对新加坡的“国家意识”，移用地名也将较难增加。

新增的地名中，有许多是英文生造词，如下表所列：

生造英文专名	官方翻译	拼写成分释义
Amberwood	安柏木	Amber（琥珀），wood（木）
Anchorevale	安谷	Anchore（锚），vale（谷）
Bayshore	碧湾	Bay（湾），shore（滨）
Bayfront	贝弗兰	Front（前），Bayfront又译为海湾舫
Eastwood	东林	East（东），wood（林，木）
Greenleaf	绿叶	Green（绿，青），leaf（叶）
Greenwood	青木	Wood（林，木）

这些生造词皆不见于中学程度字典 The Oxford Paperback Dictionary（1979年版）。政府一方面要人们讲正确的英语，但是又在地名上造了些生僻字，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制造了“混乱”。不过，话说回头，这些新拼写地名，还算简单明了，算得上较有创意。

河谷路（River Valley Road）是旧地名，被音译为里峇峇利路。盛港新镇因旁依实龙岗河，所以有六条路以Rivervale为专名，其实Rivervale就是River Valley，还好后者早以音译立名，所以前者可意译为“河谷”。像这种文字游戏还有Riverina与Riviera，前者被意译为丽河，而后者被音译为里维拉。

(四) 旧俗称地名消失与新俗称地名的兴起

随着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教学普及，英语地名对年轻人来说，已不似先辈们那样视同陌生。先辈们因不懂英语地名而“民间”创立俗称地名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那些出生于新加坡立国以后的年轻人，对俗称

地名知之甚少。俗称地名将慢慢步入史迹长巷，只能靠文字流传下去。但是，每一条俗称地名就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是先辈们对历史的记录与流传。

与旧俗称地名慢慢消失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新的俗称地名的兴起。它们大都与建筑物或商店的名称联系在一起。例如美芝路（Beach Road）黄金大厦一带被称为“小泰国”、如切路（Joo Chiat Road）一带被称为“小越南”、武吉巴督东5道（Bukit Batok East Avenue 5）一带是“小桂林”、乌节路幸运广场一带称为“小菲律宾”；人们都知道新达城的位置，但不一定知道它在淡马锡大道（Temasek Boulevard）。Suntec City是否将是后者的俗称，只能拭目以待。这些新俗称地名，现在还没有人收集，它们会不会流传下去，还是未知数。

（五）与历史越来越脱节

有些地名的通名或专名是名不符实的，例如广场（plaza或square）不大；花园（以garden或gardens为通名）没花径；东林（Eastwood）树木无几；西林（Xilin）在东部，而且有树没林；“海风园”离海至少有三公里。这些地名有名无实，更不会具有历史的意义。

名实不符的地名，主要由于历史、地理的变迁而形成的。新加坡虽然未曾大量修改地名，但随着建设的发展，命名了许多新地名，许多与历史挂钩的旧地名因而消失了。新加坡地名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与历史越来越脱节。

（六）派生地名越来越多

以一个专名为主，后加不同的通名，形成一系列的派生地名，这是英国地名的命名方式，古已有之，所以殖民地政府照用不误。由于这是一向的惯例，因此大巴窑新镇在1966年建立后，以大巴窑为专名，以“数字+巷”或“方位”为通名，产生一系列的派生地名。计有：由大巴窑1巷到8巷、大巴窑1A巷、大巴窑8A巷、大巴窑中路、大巴窑东路、大巴窑北路、大巴窑西路、大巴窑坡、大巴窑工业区及惹兰大巴窑，共17条地名。

自此以后，新镇如勿落、宏茂桥、黄埔、兀兰、裕廊、淡滨尼等都一律不变的采用派生地名。直到上世纪末，新镇盛港陆续建好时，才有所改变。该新镇近海，旁有小河，就以“anchor（锚）”、“compass

（罗盘）”、“river（河）”为词根，加上词尾“vale（谷）”，创造了三个生造的拼写词“Anchorvale”、“Compassvale”及“Rivervale”，再加上“盛港”，成为该镇的四个专名。这可是一次新的突破。近年来，由于人们对新组屋的需求已达饱和，未有新镇出现，是否在地名方面有新的突破，这只能拭目以待。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派生地名将历久弥新。

（七）序列 / 数字地名由少至多

如前所述，数字地名二战前只出现在芽笼路一带。1966年左右，大巴窑新镇开始采用数字的派生地名，镇内的地名多数以大巴窑为专名，附加“数目+巷”为通名则有10项，即大巴窑1巷到8巷、大巴窑1A巷和大巴窑8A巷。值得注意的是“数目+巷，英文形式为Lorong X（数字）”的通名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因为后建的新镇虽然采用同样的构词法，但是把通名改用“数目+道”、“数目+街”或“数目+路”（稍晚之事）。这种构词法一直延续将近30年。在现存的地名中，将近有600条的数字地名，估计这数量会继续不断的增加。与当今的“数字世界”并进。

至于用英文字母的序列地名二战前只出现在直落古楼一带，大约10年前才在数个集装箱码头再次出现，为数不多。还有，那些在数字后加英文字母如“2A”，本书归纳为数字地名。

（八）忽视文化内涵

上节提到大巴窑镇以大巴窑为专名，以数目或方位等为通名，这样的地名命名方法，是模仿美国的街道命名，缺乏内涵和创意。在约30年间，所建的新镇，都是如法炮制。原是“文化沙漠”的新加坡，地名的文化意味逐渐销蚀，显得“黄沙滚滚”。如前所说，到了1996年，才稍有改变。当年建设盛港新镇时，除了有数条道路以盛港为专名外，其余的以Anchorvale、Compassvale、与Rivervale为专名。

从前，大巴窑坡是条狭小的道路，虽在大巴窑镇里，由于中间那段道路是单行的缘故，从大巴窑坡出发，必须经过两条镇外的路，方能到达大巴窑镇。因此，尽管采用同样的专名以方便识别，但还得考虑个别细节问题。

白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美丽地名，它在新加坡的东北部，从前那里有洁白的沙滩而成为海浴胜地，与马来西亚的柔佛只有一水之隔。新镇建

成后，白沙依巫文 Pasir Ris 而音译为“巴西立”，这又是弃内涵而逐简单（采用最简单的音译）的文化倒退实例。

（九）随时代而更新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新的词汇不断地被创造出来，间接地影响到地名的转换，因此详细分析地名的构词，尤其是通名部分，可以发现地名的时代性。

新加坡的蓬勃发展始于1970年左右。经济繁荣后，才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通名如公园大道（Parkway）及高速公路（Expressway）出现于1980年左右。Square在很久以前就是通名（共有20左右条地名以它通名），它被“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翻译为“场”，但在1995年左右，静悄悄地由“场”变成“广场”。Plaza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词汇，也被翻译为“广场”。美国规模大的购物中心都称为“mall”，于是mall在1995年左右也被引进地名词汇，但它又被翻译为广场。单看华文地名如：浮尔顿广场、金岭广场、滨海广场是分辨不出它们之间的时代性差异。但是从它们的英文地名就可以知道Fullerton Square是老地名，而且那不是购物中心。Goldhill Plaza及Marina Mall却是两大购物中心，不过前者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其他的通名如域（field）、转换站（interchange）、入口（gateway）、宏道（grande）、畔道（promenade）等都是新的通名。

至于序列与数字地名的时代性，已在本节（七）详细讨论过，所以不在这里重复。

1979年，新加坡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汉语拼音的地名应时而生，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逐渐出现这种新地名，然后在后港、义顺、碧山及盛港等新镇大行其道。

（十）历史人物纪念性地名的消失

新加坡历史地名命名的缺憾之一，是许多历史人物未曾有纪念性的地名存在，下面略举几个例子：

陈银夏，1819年前就在新加坡种植大量的甘密和胡椒。

曹亚志为莱佛士先上岸探清实况后，莱佛士才敢登陆新加坡，被赐梧槽一带土地。曹亚志事迹参见下文Rochor Canal Road。

当今上年纪的人，对李光前很熟悉，但是，再过50年或100年，人们也可能把他们像陈银夏与曹亚志一样给忘了。因此有必要在适当的情况

下为以上几位及许多的先辈“地上留名”。李光前先生的事迹参见下文 Kuo Chuan Avenue。

不仅许多历史人物未曾有纪念性的地名存在，一些以历史人物命名的早期地名也逐渐消失了，如：

法古华（法夸尔）街（Farquhar Street, Farquhar 是首位驻扎官）

贝纳特街（Francis Bernard, 第一位警监）

牙直利巷（Guthrie Lane, 牙直利先生创于1821年的洋行至今屹立于新加坡）

庄士敦码头（A L Johnston, 在1820年设立新加坡第一间洋行）

为免遗忘历史，本书专记如上，以为存照。

（十一）余言

无可否认，新加坡政府向来推行功利性极强的资本主义政策。在中国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1990年以前），很多提高华文水平的策略与运动，都是言多于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年地铁（即地下铁道系统或称 MRT）刚建成时，公众一片哗然，因为只有英文告示牌。华人社团与舆论强烈要求设立华文告示牌。但是，政府以各种理由反驳或拖延，一直不付诸行动。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旅客逐年大幅度的增加。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地铁公司终于在2005年“广纳良言”，在所有的地铁站树立了华文告示牌（同时也包括巫、印告示牌）。自1987年11月7日地铁通车后，新加坡华人的愿望，终于由中国旅客帮忙实现了。此外，市中心的华文街道牌也日渐增加。由于中国游客日增，新加坡华文地名肯定不断地向信、达、雅这三方面发展。

从开埠到现在，新加坡的人口不断的激增。如今，总人口已近六百万，其中约30%不是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历年的新移民带来他们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大大地丰富了本地的人物风情。从形形色色的地名中可以了解到国民来自欧亚各地；占多数的英文地名反映出本为英殖民地的历史；大量的华人地名体现了华族对当地极大贡献以及新加坡作为中国以外惟一以华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的国情；众多的巫文地名体现了历史渊源及其无法与邻近国家分割的地理位置。

地名学是一门新的独立学科，从地名中，可以了解到族群的来源、地理环境、经济情况、历史演变、宗教信仰、人文知识等等。从本书对新加坡地名所作的分析，可以一窥新加坡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社会图景。

1936年的地名录载有近千条的地名，1950年，地名已增加至1600条左右，到了1960年，地名总数已超过2300条。新加坡立国于1965年8月9日，建国一代辛勤劳作，百废俱兴，道路因之而超前地增加，从1961至1971年的十年中，共增加了约1100条。其中也包括早已存在而未命名的道路与村落。之后的十年，地名增加了约240条。1990年时，地名总数接近4000条。

本世纪初，地名总数超过4100条。根据街道与建筑名称局（SBNB）提供的资料，每年新增的地名介于44至63条，而且有逐年减少的现象。在这些新增的地名中，现有道路若有延伸而无新地名，延伸部分则以新增道路来计算。由于SBNB未能提供这些资料的详细内容，我们只能推断真正新的地名肯定少于以下的数据：

2001年63条

2002年58条

2003年48条

2004年47条

2005年44条

本书出版前，作者曾再次联络有关单位，但是无法获得最新的官方资料。